



忆我的父亲习仲勋

文/习远平



父亲走了18年了。2013年10月15日,是他老人家的百年诞辰。

作为他最小的儿子,站在他的墓前,对着他的雕像,我想说些什么呢?我能说些什么呢?

他老人家走过的这百年,是中国扭转乾坤、翻覆天地的百年。这百年的中国历史太丰富了,他的人生历程也太丰富了,我看不尽,听不够,也享用不完。

我只能在思念中寻找,寻找他老人家在我一生中留下最深烙印的东西。

少儿时,父亲就教育我们说:对人,要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雪中送炭”的待人情怀不但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也从小给我们子女树立了一生待人的准则。

纵观父亲的一生,在党内生活非正常期间,历经冤屈、坎坷、磨难,却从来无怨无悔、顾全大局,一

生都在“雪中送炭”。

该谦让的,他谦让了;该忍耐的,他忍耐了;该承担的,他承担了;该挺身而出时,他挺身而出了。

他由衷地说:“我这个人呀,一辈子没整过人。”

人所共知,在党成长的漫长岁月中,无论是在“左”的或“右”的错误发生时,“没整过人”,就是在人一生最艰难的时刻帮了人。

在那些蒙冤岁月里,父亲对污蔑不实所谓“问题”,能揽过来的就坚决揽过来,宁可一个人承担责任,也绝不牵连他人。

他说:“我身上的芝麻,放在别人身上就是西瓜;别人身上的西瓜,放在我身上就是芝麻。”许多人听了这话落泪。

“没整过人”应该就是他老人家一生中做过的最重要的“雪中送炭”的事情。

我反复猜测……

二

见到父亲时,我震撼了。

父亲与我幼小心灵中的父亲形象已截然不同:一头乌发已然不见,瘦了,苍老了,两鬓斑白。他凝视着我们,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可谁都没想到,父亲与全家人相互打量着。见到我时,他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是近平还是远平?”

听到他这样问我,大家都哭了,父亲的泪水也夺眶而出。他一面擦着眼泪一面说:“这是我高兴的眼泪!”

唐朝诗人贺知章有诗云:“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7年生离,我识父而父不识我,真是彻底颠覆了诗人的语境。一家人最大的欣慰是父亲依然健在。与父亲团聚,长相厮守,是此刻全家人唯一的期盼。一家人感到最振奋的是:虽然岁月无情,但父亲依然是一派壮心不已的气概,我们放心了。

只是,我们心里都有一个疑团:这么多年,没人探望,远离亲人,与世隔绝,“他是怎么熬过来的?”后来,听他慢慢谈起往事,我们才知道,对父亲那些沉重岁月的表述,用“熬过来”这个说法是个天大的谬误。

身在冤狱,父亲对人民、对党的信念没有过丝毫动摇。他一直准备着为亲爱的人民、敬爱的党继续工作。

他说,马克思的晚年,不是背诵拉丁文的诗歌,来保持敏锐的思想和记忆吗?没人说话,我就对自己说话!

他开始背诵《矛盾论》、背诵《实践论》、背诵“老三篇”,不但磨砺思想,也磨砺语言。慢慢地背诵如流,昼夜不舍,晨昏无辍。本应度日如年的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悄悄溜走了。

为了保持一个好的身体,父亲坚持长年锻炼,把枯燥的身体锻炼做成了一天最愉快的事情:每天,他先是做一日两次的斗室转圈,先迈步正着转圈,从1数到10000,然后退步倒着转圈,从10000倒数到1;接着,他用肩膀撞墙,用后背撞墙,用拳、用掌击打全身;最后,仰面躺在床上,做仰卧起坐。

仰面躺着,是当时监管方要求的睡觉姿势。监管方固执地认为,侧身睡不易观察到自杀行为,坚持要求被监管人仰面睡。为了这个“奇葩”规定,父亲仰睡了多年,上千个日夜,这需要多大的意志力啊!

我想,父亲的身体锻炼中奇特地增加了“仰卧起坐”的情节,肯定是为了对这个“奇葩”规定“以毒攻毒”。

还是为了有可以持续作战的身体,父亲对自己多

年抽烟的习惯也实行了“严格管制”。

他原来每天要抽两包香烟,逐步减少到每天只抽一支烟。早饭后,点燃烟,只抽上一口就掐灭。吃完午饭,点燃再抽,这次,抽到一支烟的一半,又掐灭,放在一边。晚饭结束,才是他真正享受抽烟愉悦的时间。这次点燃烟后,可以抽完余下的半支烟。

沉冤得雪的父亲回到战友们身边时,大家都十分吃惊。小平和叶帅当时就愣住了,叶帅说:“仲勋同志,你16年备受磨难,身体竟然还这么好!”

毫无疑问,父亲在逆境中常年砥砺的敏捷思维和健康体魄,对他后来主政广东,大胆施行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石。

及至年齿渐长,阅世日深,我对父亲蒙冤人生中锲而不舍的身心砥砺有了更深的理解。16年蒙冤,父亲为什么能够天天如一地无畏面对,是因为在他心里,人民至上,党至上,为党和人民而战斗、奋斗,是他心里的无上快乐。

“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这16个字是他晚年对自己一生的总结。顺境如此,逆境亦如此。

在这样无私的精神世界里,个人荣辱得失毫无位置。无私方能无畏,父亲蒙冤生涯中的无畏,正是源自他的无私。

三

父亲一生,参与完成了党的两大历史使命:一个,是与刘志丹、谢子长一起,创建了众所周知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另一个,则是在邓小平、叶剑英的亲自支持、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创建了广东经济特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地;而经济特区的创建“杀出一条血路”,对此后中国的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到了“先行一步”的引领作用。

参与完成这两大历史使命,父亲都是“受命于危难之时”,没有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这两大使命的完成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广东经济特区的建立,我亲历其时其事。改革开放至今35年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老经济特区日新月异,带动浦东、前海、横琴、南沙、上海自贸区等一批新的经济特区成批崛起。

父亲要是还在,看到他在中央支持下亲身参与决策、参与实施的特区建设事业发展得这么快,他该多么欣慰啊!

不止一个人问过我,你父亲甫一复出,临危受命,主政广东,《光明日报》第一天发表解放思想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广东媒体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并在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不久,又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放权,要广东的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他的政治灵感是从哪里来的?我总是从无疑地回答说:“无私无畏!”

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政治禁区比比皆是,冲破禁区的政治勇气首先来自无私无畏的政治胸襟。要像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实实在在“杀出一条血路来”,没有无视安危、不怕犯错、责无旁贷、义无反顾的无私无畏精神,就不敢大胆颠覆禁锢思想的政治教条,也无法提出任何新观念、新政策、新办法,去面对和解决实践提出的新问题。

如我父亲者,当时有一大批老同志,由于无私无畏,变得有识有谋,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复履新后的历史贡献。(下转第2版)

小学课本里有一篇《孔融让梨》的故事,一字一句我记得特别清楚。那是父亲从小对我的特别家训。

父亲不止一次拿着课本,拉住我的手,给我讲这一课。谦让,是父亲教给我最重要的人生课程之一。

在家,谦让父母,谦让兄弟姐妹;在外,谦让长辈,谦让同学同事;谦让荣誉、谦让利益、谦让值得谦让的一切。

谦让,既意味着自己对个人荣誉、利益、所得的放弃,也意味着自我人格的升华。走入社会以后,我终于明白,父亲让我从小养成的谦让习惯,在面临复杂社会关系,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家庭与国家利益时,获益良多。不仅使复杂关系、棘手难题的处理容易获得公平、公正的结果,同时容易赢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和普遍尊重。

在我心目中,父亲是了不起的英雄。13岁上初中时,父亲就因参加进步活动,进了国民党陕西省监狱。

1962年,他因小说《刘志丹》遭遇康生诬陷,蒙受不白之冤16年,其中“文革”冤狱7年半。“文革”期间,家人无法探望他。

当时,社会上传说很多:有说他提着花岗岩的脑袋去见马克思了;有说他一次批斗以后重病而死了;还有说他自杀了,或失踪了。我们一家人心上阴云笼罩,父亲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了。

直到1972年,我们一家人利用春节千辛万苦聚首北京,打听到罗瑞卿伯伯的孩子们通过给周总理写信的方式与伯伯重逢相见,全家人才重又燃起希望。

我们一起商量说:“我们也给周总理写信。”

给总理的信发出时间不长,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来人了,其中两位还是父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时候的老人。

来人传达总理的批示说:“你们的父亲还健在,不久会安排与家人见面。”

我们既兴奋又激动。相约见到父亲时,谁都不许哭,不让父亲担心。

1962年,父亲蒙冤时,我才6岁;离开父亲时,我才9岁。在我心里,父亲早已是一个可思而不可见的梦。

梦里的父亲一头乌发、身材伟岸,既威严又慈祥。可当他一旦走近,我扑过去要抱住他时,他却消失了。

7年后,得知他还在人世,我悲喜交集。见父亲的前夜,竟一夜无眠,浮想联翩。父亲的形象一次又一次被我重新描摹。父亲见我的第一句话一次又一次被